宋金元时代的泽州佛教：佛寺后殿遗存所见

陈　豪

内容提要　泽州地区的佛寺建筑群中，有不少后殿保存有金元时期的建筑构件。结合石刻记载，可知佛寺后殿在这一时段作为法堂存在。这一遗存现象揭示了该地区金代佛教禅宗的又一次蓬勃发展。通过相关碑文，还可以明确元代风行于当地的禅宗宗派是临济宗。作为重要的物质史料，建筑遗存及其所营造的空间，能够增进我们对特定地区佛教发展过程的认知。

关键词　泽州　建筑遗存　佛教　法堂　禅宗

泽州，今山西省东南部晋城市，南临太行山，地理位置险要。该地区崇信佛教已久，有北朝佛教遗存保留至今；隋唐以来，当地民众依然葆有相当高的信仰热情，并立幢建寺；至宋元时期，僧团、寺院亦以禅宗为主流[1]。

当地留存较多宋元时期佛寺木构。从其建筑遗存出发，可以对该地区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情况有更深入的探索。笔者尝试通过对佛寺后殿建筑中早期遗构的关注，上溯其建设年代，并借助相关文字史料，讨论其建筑性质与功能，进而尝试从物质遗存史料角度，推进区域佛教史的研究。

一　关注点的切换：从整体建筑到构件遗存

由于地理、行政、文化的关联，泽州往往与潞州并称，被视为一个区域单元，称为“泽潞”或“晋东南”地区。这一地区保存有我国数量最大、密度最高的宋金元时期建筑，是古建筑研究者的重点关注区域之一。在以往对晋东南地区早期建筑遗存的研究中，那些时代较单纯、保留早期形制特征较多的单体建筑吸引了绝大多数学者的注意。

这一区域中，年代较单纯的早期建筑往往是寺庙中最为主要的建筑，对其研究确能解决较多关键问题。但同时，寺庙是由若干建筑单体构成的建筑群，其整个空间构成都值得我们关注。因此，若将关注面扩展至寺庙中其他“次要”建筑遗存，我们或许能发现更多重要信息。比如，从晋东南的寺庙遗存来

‹1›　参见张君梅：《上党佛化史论稿》，台北：新文丰出版公司，2016年。

看，有很多建筑虽然未能完整地保存早期修建的整体结构，却往往在后代屡次修建中重复利用旧材。这些保留的旧材能够提示我们特定建筑始建年代的下限，为诸多问题的展开提供相应的研究基础。

二　泽州地区佛寺后殿的早期构件遗存

在泽州地区的佛寺建筑中，有不少后殿可见重复利用的早期旧材。对这些构件遗存进行整理，可发现多数后殿的始建年代下限为金元时期，这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当地佛教的发展情况。

1. 泽州高都景德寺

高都景德寺位于泽州县高都镇高都村中，于宋真宗景德四年(1007)获赐“景德寺”为额，名称沿用至今。寺院坐北朝南，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、紧贴山门的过殿、中殿和后殿。其中，后殿为面阔五间的单檐悬山顶建筑，保存较多早期遗构：前檐方形抹角石柱，柱下设素覆盆柱础，柱头五铺作单杪单昂计心重栱，昂为真昂，下出单瓣华头子；横栱、替木端头抹斜；惜耍头、昂嘴被锯，现状为后代维修而成；铺作里转出双杪偷心，不设补间铺作，扶壁重栱；殿内进深六架椽，4－2分椽，对接梁栿底皮不同高；室内原仅当心间设两柱，设粗大内额，柱额交接方式与高平崇明寺、阳城开福寺后殿相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后殿后檐柱头铺作保存有该殿目前可见时代最早的形制特征：四铺作单杪，令栱与替木均抹斜，所有斗的斗欹曲线下撇出锋。这一北宋中后期斗栱形制[1]特征恰与前檐石柱上部北宋元祐二年(1087)题记相合〔图一〕。

2. 陵川龙岩寺

陵川龙岩寺位于陵川县梁泉村，坐北朝南，现为两进院落。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(现为遗址，地面建筑已不存)、中殿与后殿，轴线东西两侧为廊庑。龙岩寺中殿的大木结构基本保存金代形制，与寺院内金大定三年(1163)《龙岩寺记》碑所记载的修建年代相吻合，学界已有相关的记录、测绘和建筑尺度等方面的研究[2]。但现有研究均集中于中殿，对龙岩寺内的其他建筑遗存不甚关注。

事实上，龙岩寺后殿的前檐斗栱从形制上看，除耍头外，其他构件形制较符合北宋晚期至金大定年间的特征(个别构件为维修替换)[3]：后殿为面阔五间的悬山顶建筑，前檐不设补间铺作，有柱头铺作六

‹1›　该地区宋金建筑斗栱形制与梁架结构的分期结论，见徐怡涛：《长治、晋城地区的五代、宋、金寺庙建筑》页51－57，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03年。北宋中后期的重要特征为斗欹曲线上曲下撇出锋、横栱(替木)端头抹斜等。

‹2›　晋东南专员公署、中央建筑科学研究院编：《上党古建筑》，图版64、65，中国科学院印刷厂，1963年；张驭寰：《陵川龙岩寺金代建筑及金代文物》，《文物》2007年第3期；朱向东、王寅君：《山西陵川龙岩寺中央殿建筑特征源流探析》，《安徽建筑》2011年第2期；刘畅、姜铮、徐扬：《山西陵川龙岩寺中央殿大木尺度设计解读》，《建筑史(第37辑)》页8－24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，2016年。

‹3›　前揭徐怡涛《长治、晋城地区的五代、宋、金寺庙建筑》，对宋末至金大定年间的斗栱构件形制组合，概括为D3(“斗欹曲线斜杀内凹曲线下部不出锋”)、H1(“横栱(替木)端头平直”)、S4－1(“爵头状耍头，直线亚型”)、A2－1或A2－2(“斜杀曲线型昂，琴面或平面”)、方形交互斗、双瓣真(假)华头子、计心重栱造，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华栱作假昂状、假华头子、方形讹角栌斗、圆栌斗、束栌斗；到金大定以后，又开始出现横向构件端头抹斜、下昂状、楮头状和爵头状耍头并存，且往往呈弧线型，昂嘴逐渐高挑，亦存在五边形交互斗。

〔图一〕高都景德寺后殿
1. 后殿正立面　2. 后殿室内梁架　3. 石柱题记　4. 后殿后檐柱头铺作　5. 后殿室内（吴煜楠摄）


1


2


3


4


5

朵，铺作次序为五铺作单杪单昂计心单栱，方形栌斗、交互斗，横栱端头平直，扶壁单栱素枋隐刻慢栱，琴面假昂，昂面不起楞，昂嘴较薄，昂下为饱满的双瓣假华头子；铺作里转出双杪偷心，上承经晚期替换的劄牵，劄牵前出耍头〔图二〕。

后殿前檐廊下有金大定二十五年（1185）《新建龙岩寺法堂记》碑，立碑时间与前檐柱头铺作形制所反映的时代相吻合，又云斯堂“广五间”，与建筑现开间数亦合。因此，龙岩寺后殿前檐斗栱可视为金代新建时的遗存。此外，后殿后墙外尚可见一巨石紧贴，与碑文所记“栋宇斯架，覆石像于中”亦相符。尽管后殿室内梁架已全无早期形制特征‹1›，但至少可以由此确定，金代大定年间，龙岩寺中轴线上已经是前歇山殿、后悬山堂的平面布局形式。

3. 泽州崇寿寺

泽州崇寿寺位于泽州县巴公镇西郜村，寺院坐北朝南，前后三进院落，有北魏风格的造像碑和两座石质经幢。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、前殿、中殿和后殿，中殿木构时代属北宋晚期‹2›。现存后殿为面阔五间的悬山顶建筑，七架椽屋劄牵对六椽栿用三柱，前檐各间设补间铺作一朵，柱头铺作尚有金代形制特征：四铺作单昂，琴面假昂，昂嘴较薄，昂下为双瓣假华头子，后尾出一跳华栱承托劄牵。但室内梁架已全无早期特征〔图三〕。

‹1›　从形制来看，梁架时代较晚，且与《新建龙岩寺法堂记》碑所记“广五间、各八椽”之椽架数不符。

‹2›　前揭徐怡涛《长治、晋城地区的五代、宋、金寺庙建筑》，页38。

寺院内金天会八年(1130)《崇寿寺新修三门记》载："佛殿、法堂、行廊、僧舍俱已完备，而三门尚阙"，结合建筑遗存和石刻史料可以推测，现所见后殿有可能就是碑文中在金代已存的"法堂"。

4. 高平开化寺

高平开化寺位于高平陈岖镇东北舍利山山腰，寺院坐北朝南，有东、西两组院落，西路为寺院宗教活动场所，前后两进院落。中殿木构为北宋时期遗存，寺院东北角观音阁前檐斗栱形制保留金代特征，由其东墙金皇统元年(1141)《高平县舍利山大愚禅师作心王状奏六贼表并韵母三十字》石碣可知，该阁在金代名为"禅师殿"[1]。寺院现存后殿为现代新修，但在徐怡涛调查时尚为遗址，面阔三间，仅存石柱和残壁[2]。由元至顺元年(1330)《皇元重修特赐舍利山开化禅院碑并序》记："中孚大雄殿，后以演法堂，前钟层楼"可知，至迟在元代，寺院已有后殿，又禅师殿所在位置为后殿挟殿，其始建不晚于金，则开化寺后殿的始建时代也必然不晚于金代。

5. 阳城开福寺

阳城开福寺位于阳城县南城东街，坐北朝南。寺院现仅存中轴线上三座建筑，依次为戏台、中殿和后殿。中殿和

〔图二〕**陵川龙岩寺后殿**
1. 后殿外立面　2. 后殿柱头铺作
3. 后殿前廊　4. 后殿室内梁架


1



2


3


4

〔图三〕**泽州崇寿寺后殿**　彭明浩摄
1. 后殿外立面　2. 后殿室内梁架
3. 后殿前檐斗栱　4. 后殿前廊


1


2


3


4

‹1› 前揭徐怡涛《长治、晋城地区的五代、宋、金寺庙建筑》，页15－17、79。

‹2› 前揭徐怡涛《长治、晋城地区的五代、宋、金寺庙建筑》，页10。

〔图四〕阳城开福寺后殿
1. 后殿外立面　2. 后殿前檐铺作　3. 后殿室内西侧梁架
4. 后殿室内柱网　5. 后殿东侧室内梁架　6. 后殿室内北侧梁架


1


2


3


4


5


6

后殿均保存较多早期建筑特征。后殿为面阔五间的单檐悬山顶建筑，施素覆盆柱础，除当心间外，不施补间铺作，明间和梢间两端柱头斗栱为五铺作双昂计心重栱，横栱端头平直，爵头状耍头，昂嘴琴面，中央起棱，梢间内侧柱头为五铺作单杪单昂计心重栱，栌斗作瓜楞状；铺作里转出双杪，上施楷头承四椽栿；殿内进深六椽栿，4—2分椽，对接梁栿底皮不同高，原初仅布置两根内柱，柱间施粗大内额，与高平崇明寺、泽州高都景德寺等建筑室内相仿。从斗栱形制来看，后殿始建年代亦当不晚于金代〔图四〕。故金代开福寺中轴线上为前歇山殿、后悬山堂布局。

6. 高平嘉祥寺

嘉祥寺位于高平市三甲镇赤祥村，坐北朝南，现中轴线上有山门、中殿和后殿，后殿之后有新雕四面观音像，观音像后近代重建的排房原也属于寺院范围之内。寺院内现存时代最早的遗物为中殿前所立二经幢，刻于五代后周广顺三年(953)。

寺院现中殿为面阔三间的歇山顶建筑，从斗栱和梁架的形制来看，尚保存较多金代特征；后殿为面阔五间的悬山顶建筑，亦保存较多金代特征：殿前檐仅设柱头铺作，补间隐刻异形栱；柱头四铺作单昂，扶壁单栱素枋，令栱端头平直，除两角柱上设方形栌斗外，其余柱头施讹角栌斗；昂为假昂，略呈琴面，其下三瓣假华头子，与中殿铺作第一跳假昂较为相似，方形交互斗；耍头原为蚂蚱头，后代在其上叠加卷云状构件；里转华栱一跳，上承楷头，托四椽栿。室内进深六椽栿，4—2分椽，乳栿衬于四椽栿下，用铺作铰接，梁栿用自然材，叉手不抵槫。根据现存木构状况，可以推测嘉祥寺现存后殿建设不晚于金，且梁架分椽与室内空间亦保留较多早期特征，室内方形抹角石柱下柱础时代可能更早〔图五〕。

嘉祥寺内现存碑刻时代均较晚。按清乾隆五十六年(1791)《补修嘉祥寺创建西林书院碑记》：“寺之规模广廓，中殿三佛、后殿七佛……前转果殿大佛、南殿观音大士，皆前代次第建立”，可知至迟于清代，寺院中轴线上依次布置四殿；民国二十二年(1933)《赤祥村嘉祥寺归全里五村公有息讼碑记》又载：“考察历代碑碣，原由住僧化修创始于周之广顺三年，宋、金、元迄明、清，屡经重修、增修。其始则仅有三佛殿前两院，明成化间，乃增修后院七佛、诸天、十王殿、东禅院。考查七佛殿中明正德己巳年间邑人王琦文瑞所撰碑文，言之綦详。”由以上信息推知，明代以前寺院平面为两进院落，与寺院现状四面观音像以南的平面格局恰相符。因此，现在所见的后殿在明成化以前亦为嘉祥寺之后殿，当时的寺院中轴线建筑也是前歇山殿、后悬山堂。

〔图五〕高平嘉祥寺
1. 嘉祥寺中殿　2. 中殿柱头铺作　3. 嘉祥寺后殿（吴煜楠摄）　4. 后殿柱头铺作（一）
5. 后殿柱头铺作（二）　6. 后殿柱头铺作（三）　7. 后殿室内（吴煜楠摄）　8. 后殿室内柱础（吴煜楠摄）


1


2


3


4


5


6


7


8

7. 陵川南吉祥寺

陵川南吉祥寺现位于陵川县平川村。据《晋城金石志》记载，有天圣年间所立《南吉祥寺移建碑记》，载“潞城里崔氏寄居平川，年迈乏嗣，自捐资财，创修中央殿三间”[1]。寺院内西廊下宋天圣八年(1030)《南吉祥院碑文并序》记该寺于淳化三年获赐额，现存中殿主要木构形制属北宋中前期，与天圣碑纪年相符[2]。但已有研究亦多关注中殿，并结合寺内现存碑记，陈述寺院于元代重修之事，但

‹1› 2018年9月现场调查未见此碑。此据晋城市地方志丛书编委会编著：《晋城金石志》页42，海潮出版社，1995年。

‹2› 早期调查时，有观点认为其为金代建筑遗存，前揭晋东南专员公署、中央建筑科学研究院编《上党古建筑》，图版52；随着学界对晋东南地区建筑形制断代的认识加深，确定其为宋代建筑遗存，《上栋下宇 历史建筑测绘五校联展》页80，天津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；前揭徐怡涛《长治、晋城地区的五代、宋、金寺庙建筑》，页58、61。

〔图六〕陵川南吉祥寺后殿
1. 南吉祥寺后殿　2. 后殿前檐柱头铺作　3. 后殿前廊
4. 室内晚期题记　5. 后殿室内梁架



1



2



3



4



5

对后殿的讨论付之阙如。

南吉祥寺的后殿面阔亦为五间，悬山顶，同样不设补间铺作，有柱头铺作六朵，个别构件为新修替换，从前檐铺作的形制来看，当属金代遗存。铺作次序为五铺作单杪单昂计心重栱，方形栌斗、交互斗，横栱和替木端头平直，扶壁单栱素枋隐刻慢栱，补间隐刻异形栱，琴面假昂，昂面不起棱，昂嘴较薄，昂下为双瓣假华头子；铺作里转出单杪，上承楷头，托整体经后代替换的梁架。现后殿进深六椽，殿内脊槫下还有明崇祯三年和清咸丰四年的重修题记〔图六〕。

尽管南吉祥寺内现无金代文字史料遗存，但基于斗栱形制，可以合理推测金代时后殿即存，为面阔五间的悬山顶建筑。因此，该寺金代中轴线上亦为前歇山殿、后悬山堂建筑。

8. 高平游仙寺

高平游仙寺位于高平市河西镇宰李村东北，寺院坐北朝南，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、前殿、中殿和后殿。现学界基本公认游仙寺前殿年代可追溯至北宋，中殿面阔五间，单檐悬山顶，前檐斗栱有金代特征，后殿创建于明[1]〔图七〕。故明代以前寺院的“后殿”即为现存可上溯至金代的“中殿”。寺内现存石刻史

‹1› 参见古代建筑修整所：《晋东南潞安、平顺、高平和晋城四县的古建筑》，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8年第3期，限于当时的认知，认为游仙寺前殿为金代遗构，后殿为明早期建筑，后随着学界对晋东南地区木构建筑形制年代认知的推进，更新了对两殿时代的认识，参见前揭徐怡涛《长治、晋城地区的五代、宋、金寺庙建筑》；李会智：《高平游仙寺建筑现状及毗卢殿结构特征》，《文物世界》2006年第5期；贾珺、李竞扬：《高平游仙寺营建历史考略》，《建筑史（第40辑）》页11—24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，2017年；李竞扬：《游仙寺石碑中的高平李家》，《中国文化遗产》2017年第5期。

料中并无金代碑刻遗存、亦无金代工程的相关记载，但金朝时李晏父子在泽州为官，李晏撰文认为其六世祖李通敏隐居于今游仙寺，至蒙古乃马真后三年（1244），李晏之孙李肯播捐施墓田给佛寺，故金元时期游仙寺的建设可能与李氏家族有关‹1›。

〔图七〕高平游仙寺现“中殿” 彭明浩摄
1. 游仙寺现中殿外立面 2. 中殿前檐铺作 3. 中殿前廊 4. 中殿室内梁架



1



2



3



4

9. 高平定林寺

定林寺位于今高平市米山镇大粮山南麓，坐北朝南，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、前殿、中殿遗址和后殿。前殿东侧廊庑檐下有金大定二年（1162）《重修善法罗汉二堂并郭公施功德记》碑，记：“至僧法兴，乃上党王氏之子……闵法堂之久弊，恐致崩摧。会本朝皇统八年，诱化仁人共出财力，建立五楹，翠飞雄伟，不日告成”，又寺内清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）《定林寺七佛殿创修西阁记》载：“定林寺七佛殿，成于顺治庚子年，居寺之极巅。”‹2›从寺内建筑现状来看，前殿从遗存现状来看尚存金代特征，但其为面阔三间的歇山顶建筑，必非金代所建法堂；后殿始建于清，故可合理推断定林寺中殿遗址即位金碑中所记载的五楹法堂〔图八〕。

〔图八〕高平定林寺中殿遗址 彭明浩摄



10. 泽州青莲寺

泽州青莲寺位于晋城东南，南临丹河，北倚硖山，分上下两院，是泽州地区历史悠久的著名寺院。下院已无早期木构遗存；上院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获赐“福严禅院”额牒，建筑保存情况较好，中轴线上自南向北依次坐落山门、阁、中殿和后殿。除中殿主体结构基本呈现北宋时期特征外，殿前阁之上层、中殿东配殿二层，亦保留较多早期形制。寺内后殿于20世

‹1› 参见前揭李竞扬《游仙寺石碑中的高平李家》。

‹2› 刘泽民总主编，常书铭主编：《三晋石刻大全·晋城市高平市卷（上）》页276，三晋出版社，2011年。

〔图九〕泽州青莲寺后殿
1. 现青莲寺新修后殿　2. 后殿石柱题记（一）
3. 后殿石柱题记（二）　4. 后殿室内柱础


1


2


3


4

纪90年代重修建成，但原遗址保存前檐石柱六根[1]，柱的上部均有“泰和元年”的题记，提示该殿的创建年代下限〔图九〕。据阁内所立金泰和六年（1206）《大金泽州砚石山福严禅院记》：“崇宁间，鉴峦禅师继主其教。以其寺基久远……乃刻意规画，度越前辈。凿东崖，堙西涧，培薄增卑，以广寺址。由是，供佛有殿，讲法有堂，构宝藏以贮圣经，敞云房以栖法侣。宾寮香积、法鼓斋鱼，焕然大备。皇朝大定初，福裕、惠珍二法师嗣之……寺旧有法堂三楹，不称殿阁规，而广之为五楹，未果谢世。赖寂、定二师兄左右辅翼，乃克就绪。自远公而来几七百余岁，子孙绳绳，经营堂构，成于今日”，可知寺院在崇宁年间经过一次规模宏大的重修活动，工程所创的寺院格局延续至今[2]，至迟在宋末修造完工时，寺院内即有三间法堂，入金后改建为五楹，改建工程在大定至泰和年间，与殿前檐石柱题记所记时代相符。

11. 陵川北吉祥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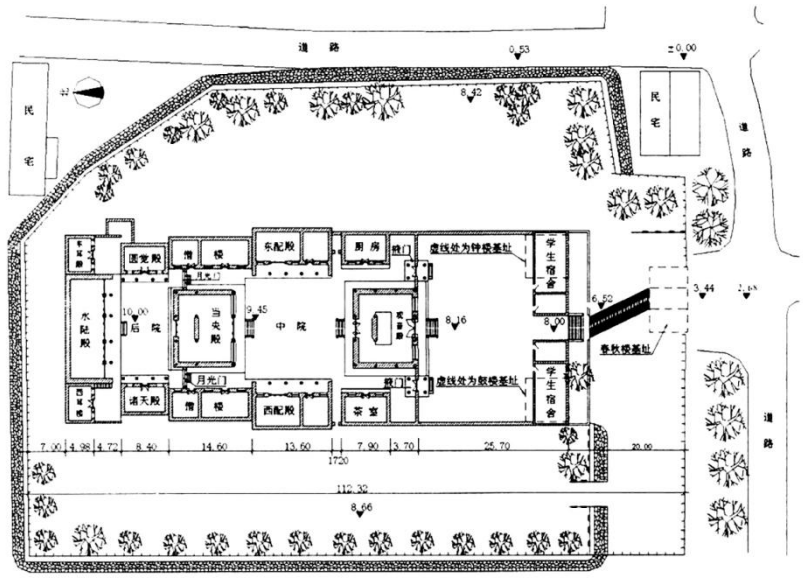
北吉祥寺位于陵川县礼义镇西，中轴线上自南向北依次为前殿、中殿及后殿，其中前殿和中殿具有金元时期特征，后殿时代较晚，现后殿东墙外立明成化十四年（1478）《创建吉祥寺水陆殿记》碑，结合碑记可知现存后殿为水陆殿，其创建不早于明。前殿单檐歇山顶，是现存寺内等级最高的建筑，从梁架分椽方式与殿内佛坛设置来看，其性质属于佛殿，又寺院所在位置较周围道路为高，前殿之前与寺前台阶之间，有较为宽广的广场；早期维修工程中的图纸在广场南侧标出钟鼓楼遗址。因此，从寺院整体平面现状和单体建筑规格来看，现存“前殿”在早期寺院平面中当为“中殿”，现存“中殿”当为早期寺院平面

‹1› 参见李会智、高天：《山西晋城青莲寺史考》，《文物世界》2003年第1期。

‹2› 金大定四年（1164）《砚石山福严院重修佛殿记》碑亦载：“砚石道场，其来尚矣。爰自唐大顺中，有法师玄依，誓就远公掷笔台下筑室栖息，其徒相继兴造。至宋崇宁间，得大师鉴峦修新易陋，方见完备。今僧福裕，复顾峦所创殿跡漏欲坏，乃于皇朝大定三祀，募缘重构，辉华壮丽，照映山林。宜立碑石，以传后裔。”刘泽民总主编，王丽主编：《三晋石刻大全·晋城市泽州县卷》页57，三晋出版社，2012年。

中的“后殿”〔图十〕[1]。

〔图十〕陵川北吉祥寺平面图
采自马吉宽：《陵川北吉祥寺前殿维修工程概述》，《古建园林技术》2010年第2期



北吉祥寺现中殿面阔三间，单檐悬山顶，补间隐刻异形栱，柱头铺作呈金末元初的形制特征：前檐铺作外跳五铺作双昂，昂嘴较厚，琴面不起棱，计心重栱，横栱与替木均抹斜，扶壁单栱素枋，方形交互斗，耍头爵头状；里跳双杪上托楷头承四椽栿，第一跳上出异形横栱；后檐铺作为四铺作单栱，令栱替木亦抹斜。此外，该殿还较为完好地保存早期室内梁架：进深六椽，四椽栿对乳栿用三柱，内柱柱头卷杀明显，乳栿与四椽栿铰接，衬于四椽栿下，对接梁栿底皮不同高，梁栿之上用蜀柱合沓，叉手稍抵槫。故北吉祥寺早期寺院中的“后殿”为4—2分椽；另值得一提的是，该殿前檐四柱中，东西两端为平面方形抹角石柱，中间两木柱呈现极为明显的梭柱形态，东西础石莲瓣形式与中间两础不同，础石形制古朴，这些有可能是该殿早于金元时期的遗存[2]〔图十一〕。

从寺院内现存石刻史料记载来看，前殿东侧天顺三年(1459)《□□泽州陵川县礼义镇重修吉祥寺碑》记：“碑之所载，大元至元十六年己卯(1279)岁次癸酉月十五日庚寅工缘完毕……率同本寺僧行先修佛殿、次整厨库、廊庑、禅堂、方丈、云室、楼阁、东西三门砌磨基……创塑正殿佛像、左右香花绘画、水陆十方诸佛诸、大菩萨□像十王，轮奂一新，又建经藏祖师殿堂二所，金壁增辉，□复衬其成事力功……之□也，今至天顺三年工将毕矣”[3]；前殿北墙石碣记“元贞二年(1296)重修 住院僧满庆；洪武十八年(1385)重修 住院僧圆泰；康熙四十一年(1702)十月十七日重修告成 住院僧兴如勒石”[4]，可知北吉祥寺在元至元十六年和元贞二年经过重修，入明后又有洪武、天顺的重修工程，前殿与中殿的木构遗存现状或与元代重修有关。

12. 陵川宝应寺

宝应寺位于陵川县礼义镇东沟村北关岭山，其北有始凿于北魏的石窟。寺院现规格宏大，但有早期遗构的建筑仅后殿一座。后殿面阔五间单檐悬山顶，前檐仅设柱头铺作，出一跳假昂，琴面昂嘴较厚，

‹1› 图中“当央殿”即现“中殿”，本文所推测的早期寺院“后殿”。

‹2› 北吉祥院于宋太平兴国三年获赐，赐名碑现仍存寺内；寺院内明代碑文称其始于唐大历年间。

‹3› 现场调查录文。

‹4› 现场调查录文。

〔图十一〕陵川北吉祥寺现“中殿”
1. 北吉祥寺现“中殿”　2. “中殿”前檐铺作　3. “中殿”柱础（一）　4. “中殿”柱础（二）
5. “中殿”室内梁架　6. “中殿”室内　7. “中殿”北立面　8. “中殿”后檐铺作


1


2


3


4


5


6


7


8

单瓣出尖假华头子，自栌斗起每跳出斜栱，令栱抹斜，扶壁单栱；里跳单栱承劄牵，亦出斜栱，第一跳上出横栱抹斜；耍头为后代更换。劄牵下设前廊，室内4－2分椽，内额较粗，内柱移柱造，柱额间用蝉肚式绰木枋交接。从这些形制特征来看，宝应寺后殿的时代可以上溯至金元，宝应寺石窟有有至元三十年碑铭，或与此次修建有关〔图十二〕。

13. 高平崇明寺

崇明寺位于高平市东南圣佛山东麓，坐北朝南，两进院落，中轴线上，中殿为面阔三间、进深六椽的歇山顶建筑，其木构遗存属北宋初年，后殿为面阔五间的悬山顶建筑。从后殿现存前檐铺作来看，呈元、明时期的特征：前檐斗栱各间施补间铺作一朵，柱头铺作为五铺作双昂计心单栱，补间铺作为五铺作双杪计心单栱，当心间另出斜栱；铺作用五边形交互斗，柱头铺作昂嘴较厚、中央起棱，补间铺作华栱中央亦起棱，所有横栱均抹斜，扶壁单栱素枋，耍头蚂蚱头，内凹曲线较为明显；所有斗栱坐于石柱上的大额。室内4－2分椽，乳栿与四椽栿用铺作铰接，仅当心间施两石柱，室内铺作层下亦施粗犷内

额，额与石柱的交接方式为当心间内侧出斗栱承额，外侧作楮头承额。寺内石刻史料对后殿的记载仅可上溯至明万历年间，有万历十九年(1591)《崇明寺重修正殿前墙记》嵌于后殿前檐，殿内石柱上亦有同年捐助题名，但殿内大额的施用方式与，高都景德寺、阳城开福寺后殿类似[1]〔图十三〕。

14. 高平资圣寺

高平大周资圣寺位于高平市马村镇大周村，坐北朝南，中轴线上亦为山门、中殿和后殿，中殿为北宋时期建筑，后殿斗栱除用昂状耍头外，其出跳次序、构件形制、与崇明寺后殿相近；室内梁架亦为六架椽，5－1分椽〔图十四〕。

〔**图十二**〕**陵川宝应寺后殿**　彭明浩摄
1. 宝应寺后殿外立面　2. 后殿室内梁架（一）　3. 后殿室内梁架（二）
4. 后殿室内梁架（三）　5. 后殿前檐铺作　6. 后殿前廊


1


2


3


4


5


6

三　宋金元时期泽州佛寺后殿的性质功能与宗教背景

（一）佛寺后殿的性质功能

泽州地区佛寺中有早期单体建筑的共17处。除前述寺院外，陵川崇安寺、昭庆院和高平清化寺的“后殿”(歇山顶中殿以北的第一座建筑)不再有早期旧材可觅之外，有12处建筑或保存有早期建筑的材料，或有可确切查考的碑文，确定它们都在元代或更早就已经存在。

那么，佛寺后殿在元代及以前承担怎样的宗教功能呢？景德寺后殿宋代石柱题记载：“尹寨村河北

‹1›　(明)李侃修、胡谧纂：《(成化)山西通志》卷五《寺观》“崇明寺”条：“宋淳化元年建，元和间修；元甲申年重修；国朝洪武间并慈教、法兴、南普照三寺入焉”，页83，1933年影钞明成化十一年刻本。地方志所载未必全然可信，可作参考。

〔**图十三**〕**高平崇明寺后殿** 1–4为彭明浩摄，5–6为吴煜楠摄
1. 崇明寺后殿 2. 后殿前檐铺作（一） 3. 后殿前檐铺作（二）
4. 后殿室内梁架（一） 5. 后殿室内梁架（二） 6. 后殿室内梁架（三）


1


2


3


4


5


6

社崔永定，奉为先考崔从、先妣李氏、亡男元哥、亡男七哥，施石柱顶石法堂上”；“高都北社施法堂石柱并顶石”；“高都北社施法堂石柱一条”，可知元祐年间该后殿为法堂，从石柱和后檐铺作来看，当时法堂面阔即为五间。陵川龙岩寺金《新建龙岩寺法堂记》碑题明确指出佛寺后殿为法堂；泽州崇寿寺的后殿根据金天会碑所载，亦很可能为法堂；高平开化寺元碑载“后以演法堂”；前文已叙高平定林寺、泽州青莲寺后殿亦为法堂；北吉祥明成化十四年(1478)《创建吉祥寺水陆殿记》碑记载工程“葺理佛殿、讲堂、丈室、厨库”，则创建后殿时寺院内已有讲堂，后殿很有可能就是明代碑文中记载的“讲堂”；根据龙岩寺金碑，其兴建工程和住持工作的僧人垂耀，与吉祥院僧惠通相熟，有趣的是，南吉祥寺后殿的形制与龙岩寺法堂也颇为相近。可以推测，同时期其他寺院的后殿性质亦同，当时寺院中，悬山佛殿以北的后殿均为“法堂”。

（二）金代法堂的修扩建与当地佛教发展

兹将泽州地区寺院后殿的情况整理如下表[表一]，可以发现，现在可以追溯的佛寺后殿遗构中，以泽州高都景德寺的时代为最早，除了景德寺外，有一大批后殿始建时代下限不晚于金代，且现存遗构很难将其建成年代上溯至宋代的佛寺后殿建筑。这并不是说，宋代及之前寺院中就没有法堂了，实际上，在晋东南地区，寺院中轴线上依次设立佛殿、法堂是最为常见的平面布局。前述寺院中，中殿大多为三间歇山殿，保留宋代兴修时的样貌，或与后殿同建于金代，但法堂现存建筑基本上都只能追溯到金。这样的建筑遗存情况说明，泽州地区的寺院在金代普遍进行了后殿的建设或大型维修工程。经

过金代维修、重建后，寺院后殿基本均成为面阔五间的建筑。而且，这次工程并不因为寺院位于聚落中或是山林里而有所不同。因此，这一金代批量的、普遍的工程提示我们：在这一时期，人们对寺院后殿更为重视，使用更加频繁，对其建筑空间的规模也有更高的要求。石刻史料亦载："寺旧有法堂三楹，不称殿阁规，而广之为五楹""闵法堂之久弊，恐致崩摧。会本朝皇统八年(1148)，诱化仁人共出财力，建立五楹""大定十季(1170年)……重修法堂五间。"结合建筑遗存情况和碑文记载推知，金代泽州地区寺院中，法堂多经重建，体量较大，多为面阔五间的建筑。重建工程很有可能是因早期建设的法堂建筑面阔三间，体量较小，无法满足当时的使用功能，因此，这一时期泽州寺院中，法堂的重要性有所提升。

〔图十四〕高平资圣寺后殿
1. 资圣寺后殿　2. 后殿当心间补间铺作
3. 后殿柱头铺作　4. 后殿室内梁架


1


2


3


4

［表一］泽州地区佛寺后殿整理表

寺院	面阔(间)	分椽方式	梁架时代	屋顶形式	后殿遗构提示年代下限	后殿文字史料	寺院最早建筑遗构	所在地
高都景德寺	5	4-2	早	悬山	北宋	北宋元祐	后殿・北宋	泽州县高都镇高都村中
泽州青莲寺(遗址)	5(3)				金	金泰和(宋崇宁)	中殿・北宋	晋城东南硖石山腰
陵川龙岩寺	5	1-5	晚	悬山	金	金大定	中殿、后殿・金大定	陵川县梁泉村中
高平嘉祥寺	5	4-2	早	悬山	金	无明确记载	中殿、后殿・金	高平市三甲镇赤祥村
阳城开福寺	5	4-2	早	悬山	金	无明确记载	中殿・金	阳城县县城十字东街南城上
陵川南吉祥寺	5	1-5	晚	悬山	金	无明确记载	中殿・北宋	陵川县平川村(迁建)
泽州崇寿寺	5	1-6	晚	悬山	金	金	中殿・北宋	泽州县巴公镇西郜村中
高平游仙寺	5	1-5	晚	悬山	金	无明确记载	前殿・北宋	高平市河西镇宰李村东北
高平开化寺(遗址)	3				金(挟殿不晚于金)	元	中殿・北宋	高平市陈岖镇舍利山山腰
高平定林寺(遗址)	(5)					金皇统	前殿・金	高平市米山镇大粮山南麓
陵川北吉祥寺	3	4-2	早	悬山	金元	元	前殿、中殿・金元	陵川县礼义镇西
陵川宝应寺	5	1-4-2	早	悬山	元	无明确记载	后殿・元	陵川县城关镇沙河村灵泉山南坡
高平崇明寺	5	4-2	早?	悬山	元明	明万历	中殿・北宋	高平市东南圣佛山东麓
高平资圣寺	5	5-1	晚	悬山	元明	无明确记载	中殿・北宋	高平市周纂镇大周村中

（续表一）

寺院	面阔（间）	分椽方式	梁架时代	屋顶形式	后殿遗构提示年代下限	后殿文字史料	寺院最早建筑遗构	所在地
陵川崇安寺					晚于元			陵川县城东北卧龙岗上
陵川昭庆院					晚于元			陵川县西河底乡积善村中
高平清化寺					晚于元			高平市神农镇团东村中

作为“法堂”的单体建筑尤为禅宗所重视。百丈怀海《清规》“不立佛殿，唯树法堂，表佛祖亲嘱受，当代为尊也”‹1›。当然，即使在禅寺之中，佛殿也是普遍存在的‹2›。法堂在寺院平面格局中一般位于中轴线上，在佛殿之后。根据现存元代以前的禅宗清规，法堂在禅寺中承担多种功能，除住持上堂说法‹3›之外，诸寺尊宿相见‹4›、沙弥受戒‹5›、丧葬活动‹6›、施主看经‹7›、作中筵斋‹8›等活动均在法堂进行，可见其不仅

‹1› 见于（宋）道原纂：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七“禅门规式”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经（第51册）》，东京：大正一切经刊行会，1927年；（宋）宗赜集：《（重雕补注）禅苑清规》“百丈规绳颂”，《新纂大日本续藏经（第63册）》，東京：國書刊行會，1986年；参见（宋）赞宁：《宋高僧传》“唐新吴百丈山怀海传”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经（第50册）》，东京：大正一切经刊行会，1927年。法堂是演说佛法、皈戒集会的地方，在佛寺中为仅次于佛殿的主要建筑，他宗亦称“讲堂”，在早期佛寺中即有这样功能的单体建筑，但到百丈怀海禅师制禅苑规绳后，成为禅寺中最重要的建筑，南宋重要禅寺中，甚至以重阁形式存在。参见赖永海主编，杨维中等著：《中国佛教百科全书·伍·仪轨卷》“法堂”条，页44—45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；丁福保编纂：《佛学大辞典》页704，文物出版社，1984年；傅熹年主编：《中国古代建筑史·第二卷·两晋、南北朝、隋唐、五代建筑》页167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，2001年；张十庆：《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》页47、52、117，东南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；张十庆：《南宋径山寺法堂复原探讨》，《文物》2007年第3期。

‹2› “百丈禅门规式”初立之时，这种不立佛殿的方式就与社会上的礼佛需求不合，禅宗为求生存发展，寺院布局仍摆脱不了佛殿（阁）、法堂同设的格局，只是佛殿规模相对缩小。至迟在北宋时，佛殿在禅寺中普遍存在，“不立佛殿，唯树法堂”的旧规在宋代逐渐瓦解，参见前揭傅熹年主编《中国古代建筑史·第二卷·两晋、南北朝、隋唐、五代建筑》，页486；戴俭：《禅与禅宗寺院建筑布局初探》页33，佛光山文教基金会，2003年；尚晋：《宋代禅寺特征管窥》，《中国建筑史论汇刊（第伍辑）》页61—77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，2012年；王大伟：《宋元禅宗清规研究》页190—197，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13年。

‹3› 前揭（宋）宗赜集《（重雕补注）禅苑清规》卷二：“天明开静，首座率大众坐堂。闻一通鼓，首座、大众上法堂内次第雁行侧立。近法堂座为上首座。书记、藏主、知客、浴主于大众前自为一班，次第而立……第二通鼓，四知事赴参，次第而行于法堂门内拜席，近南面法座而立，监院在东。童行闻第一通鼓于库堂前排定立候，第二通鼓即随知事赴参，问讯法堂大堂大众……第三通鼓，侍者报覆，住持人出。大众普同问讯。住持人升座于禅椅前立……以上主事、从众并雁行立侧。”

‹4› 前揭（宋）宗赜集《（重雕补注）禅苑清规》卷二：“诸山尊宿相见。如大尊宿到……便敛钟集众，就法堂，安排座（或就寝堂）”；“迎接。近（迎）上尊宿入院，预先集众门首相迎，大众同上法堂……送官之法。首座大众从内为上，并须齐整不得参差。如接送官员。住持人在法堂上”。

‹5› 前揭（宋）宗赜集《（重雕补注）禅苑清规》卷九：“沙弥受戒文。行者初请得度牒……选日剃度……隔宿剃头，但顶心留方寸许，至日僧堂或法堂上安排。设戒师高座，前铺毡席……如在法堂上即别安圣像香花，供养卓子二只。”

‹6› 前揭（宋）宗赜集《（重雕补注）禅苑清规》卷七：“尊宿迁化。如已坐化，置方丈中，香花供养。……法堂上西间置龛，东间铺设卧床衣架、随身受用之具，法座上挂真。法堂上用素幕白花灯烛供养之物。真前铺道场法事，小师在龛帏之后幕下，具孝服守龛。法堂上安排了。”

‹7› 前揭（宋）宗赜集《（重雕补注）禅苑清规》卷六：“看藏经。如遇施主请众看大藏经，或藏下或法堂上。直岁安排椅卓，典座排供过，行者藏主准备茶汤香华灯烛，维那依戒腊出牓分经并坐位照牌。请法事。”

‹8› 前揭（宋）宗赜集《（重雕补注）禅苑清规》卷六：“中筵斋。如遇施主入院作中筵斋，监院先问外请僧俗客若干，食衬钱各若干，然后报住持人知，同典座定食，次辨斋料，直岁安排坐位，或在库司或法堂上。”

是讲法之处，还是僧人和施主常用的公共空间‹1›。禅寺法堂内常举办各种仪式活动，聚集众多僧众，当需要较大的室内空间。

从现存碑文来看，泽州地区的寺院有很多就是由禅师兴建或重兴的。如高平定林寺于后唐长兴年中由禅师道能革故鼎新(金大定二年《大金泽州高平县定林寺重修善法罗汉二堂并郭公施功德记》碑)，高平开化寺在后唐由大愚禅师创建(后唐同光三年《大唐舍利山禅师塔铭记并序》)，高平崇明寺由禅师行颙创建(北宋淳化二年《创建敕赐圣佛山崇明之寺记》碑)。同时，尽管寺院现已不存，从石刻史料来看，陵川古贤寺在金元时亦是当地颇为兴盛的寺院。元后至元二年(1336)《福严院重修法藏记》碑记载元代福严禅院‹2›(即今青莲上寺)补葺藏经阁，僧人捐造七百余个方匣，藏经五千余卷之事，碑阴除本寺赞成寺院外，另记"福严院廊下寺院"，其中有陵川县古贤谷禅林院的题名‹3›，可知福严院与古贤寺有较为密切的联系。实际上，福严院与古贤寺的渊源很深。陵川古贤谷禅林院的金代僧人闻悟为福严院撰写过《硖石山福严禅院钟铭》(金大定三年，1163)与《硖石山福严院重修佛殿记》(金大定四年，1164)，从碑末法眷寺院的记载来看，与元碑所载较为相近‹4›；再向前追溯，隋代高僧慧远亦依泽州古贤谷寺僧思禅师出家‹5›，其门人灵璨在仁寿末年"敕送于泽州古贤谷景净寺起塔"‹6›。福严禅院与陵川古贤谷禅林院在宋太平兴国三年赐额时均被命名为"禅院"，可知两寺主修禅宗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至宋初。

不过，从建筑遗存来看，我们似可以有更多的认识。前文已经表明，泽州地区金代法堂有普遍性的扩建活动，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可能表明，此时期法堂又被赋予了新的功能，这种使用功能需要较大空间，又或者，参与法堂相关活动的人数大幅增多；亦说明当时寺院中有足够的经济来源能够支持法堂的扩建。金代除海陵王完颜亮一朝之外，并不打击佛教发展。与辽代相比，金代的佛教政策受宋王朝影响

‹1› 参见前揭王大伟《宋元禅宗清规研究》，页197—198。

‹2› 据金泰和六年(1206)《大金泽州硖石山福严禅院记》："逮太平兴国三年，赐名'福严禅院'……崇宁间……供佛有殿，讲法有堂"，前揭刘泽民总主编、王丽主编《三晋石刻大全·晋城市泽州县卷》，页73。

‹3› 碑末记"福严院廊下寺院：青莲廨院、青莲下院、净隐寺、石虎寺、广利院、在城开元寺、南关胜因寺、仅存显庆院、高平县净福院、龙泉院、羊头山清化寺、陵川县古贤谷禅林院、宝应山圣感院、河内县下棠城天圣院"，现场调查，参见(清)胡聘之撰：《山右石刻丛编》卷三四，"福严院法藏记"，页30—33，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。

‹4› 法眷有：青莲寺、青莲廨院、维摩院、地藏院、陵川古贤谷禅林院、灵感院、宝应山圣感院主、水西社广利院、高平县净福院、龙泉院、羊头山清化寺。参见前揭刘泽民总主编、王丽主编《三晋石刻大全·晋城市泽州县卷》，页57—58；前揭(清)胡聘之撰《山右石刻丛编》卷二十，页22—25。

‹5› (唐)道宣：《续高僧传》卷八："释慧远……十三辞叔。往泽州东山古贤谷寺。时有华阴沙门僧思禅师。见而度之。思练行高世众所宗仰"，前揭《大正新脩大藏经(第50册)》，页490。

‹6› 前揭(唐)道宣《续高僧传》卷十。赵安时撰正隆四年(1159)《大金泽州陵川县古贤谷禅林院重修弥勒殿记》："自北齐天保二年建置伽蓝于此，更周历隋，名景净寺，殿阁峥嵘，廊庑岑寂，前代高僧慧远、灵璨相继居之，至唐太宗兴崇释教，贞观三年赐熟田五十顷以为常住，逮宋太平兴国三年赐禅林院"，前揭(清)胡聘之撰《山右石刻丛编》卷十九，页43—45。

〔图十五〕陵川南吉祥寺元碑碑阴（部分）





更深，思想上也更多地与宋地佛教相近，主流也是禅宗‹1›。潞州崔进之女崔法珍大约在熙宗皇统九年（1149）至世宗大定十三年（1173）倡议募捐‹2›，组织刊刻《大藏经》，刻成后运至中都献给皇室，足见当时山西南部地区佛教信仰较为兴盛‹3›。当时泽州地区经过重建或扩建的法堂，其体量大于佛殿，且在寺院中的重要性有所上升，可能暗示在金代时，禅宗在此地的又一次风靡‹4›。

四　石刻史料所见元代泽州禅宗派别

进入元代，泽州地区寺院已广泛修禅，甚至可以通过相关碑文的记载明确风行于当地的禅宗宗派是临济宗。

南吉祥寺元至治三年（1323）《维大元晋宁路泽州县云川乡平川里南吉祥禅院记》在碑题中就指出该寺当时为“禅院”，碑文叙述蒙元以来增广寺院之事，于乙卯岁（1255）“重修僧舍，创立香厨、僧堂、丈室”，后复有重修、改绘之事，碑阴有寺僧题名、助缘维那的记载，另有若干寺院刊名其上，为：“大都庆寿寺、高平县石室山普照禅寺、北吉祥寺、泽州洪福院、龙岩寺、崇安寺、灵感院、圣公寺、宝应寺、古贤寺、招庆院、慈胜院、下壁寺、〔双〕泉寺、□留县柯山寺、〔显〕真观。”‹5›〔图十五〕

大都庆寿寺原是金朝皇家佛寺，后成为蒙元时期临济宗最重要的寺院。庆寿寺占地范围很大，修筑大都城垣时，为了躲开庆寿寺海云、可庵双塔，还调整了南城垣的走向，稍向南弯曲‹6›。自受蒙古上层赏识的僧人海云于戊子年（1228）首次住持庆寿寺以来，该寺一直“以临济子孙相次”，历代住持得授“领

‹1›　任继愈总主编，杜继文主编：《佛教史》页427—429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。

‹2›　亦有研究认为真正的发起人是其师傅实公律师尹矧乃，怀州河内县人，参见王泽庆：《解州版〈金藏〉募刻的重要文献——雕藏经主重修大阴寺碑考释》，《文物世界》2003年第4期。

‹3›　参见扈石祥、扈新红：《〈赵城金藏〉史迹考》，《世界宗教研究》2000年第3期；宿白：《汉文佛籍目录》页21—23，文物出版社，2009年。

‹4›　宋代佛寺有较大规模的“革律为禅”运动，影响了律寺与禅寺的力量分配与格局，而且还波及了金元佛教。参见黄夏年、于光：《宋金元“革律为禅”运动考》，黄夏年主编：《辽金元佛教研究·第二届河北禅宗文化论坛论文集·上》页34—50，大象出版社，2012年。

‹5›　在系列寺院题名的最后，出现了道观题名，为此时期当地佛道二教的关系提供了相关线索。

‹6›　参见赵正之遗著：《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》，《科技史文集（第2辑）》页14—27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79年。

(主)临济一宗事"[1]。此处的碑阴题名表明，大都庆寿寺与陵川南吉祥禅院存在联系，这种联系很有可能与寺院所属宗派有关，或正是其"领临济一宗"的表现。

宝应寺在当时亦属临济。距寺不远有开凿于北朝的石窟，石壁上嵌有至元三十年(1293)《□泉山宝应禅院重修石洞之铭》，记元代重修石室之事，铭记："山门临济，宗祖安闲"，不仅记载了寺院宗派，还有明确的祖师姓名[2]。见于碑阴的高平县石室山普照禅寺与宝应寺类似，寺院边亦有石窟[3]。该寺现已不存，据《(成化)山西通志》卷二："在高平县北三十里，巨石内凿龛，故名"[4]，《(乾隆)高平县志》卷七："普照寺，县西北三十五里，石室山，伐石成龛，列石作嶂"[5]，可知其位于高平以北，寺院附近开凿有石龛，在当时亦为"禅寺"。按南吉祥禅院元碑，于乙卯岁(1255)住持本已荒芜的南吉祥院的僧人姬显机，在丁未年(1247)先因高平尹姬政之请开法于石室山普照禅院，可知两寺在宗教传习上必同属一宗。

因此，我们可以推测，见于南吉祥禅院碑阴的寺院至少在蒙元时期，均属于临济禅宗。这些寺院中，北吉祥寺、龙岩寺、崇安寺、招庆院(即昭庆院)至今仍有早期建筑遗存。至少在陵川地区，有较多寺院都与大都庆寿寺或多或少有些关联。

现立于高平县周纂镇大周村资圣寺中殿北侧的至元十九年(1282)《资圣寺创兴田土记》碑(后文称"资圣寺元碑")碑阴绘有"济派安闲老人嗣"〔图十六〕。按《大元重修潞州昭觉□□(禅院)记》："昔我安闲觉公大禅师者，长子人也，自幼水云淘汰，遍谒诸方，默契于法主通公，□道于临济的派，宰十大名刹，儒道大通，教禅俱会，□宗以国师之礼重焉，住持燕都开泰禅寺……皇上以方外之宾尤敬……时当辛丑之岁(1241年)也……兹寺之兴独非数乎？皆安闲之力也"[6]，知其为蒙元初年临济派僧人，祖籍长子。碑记资圣寺紫岩钦公即"得法于安闲脚下松溪老人处"，受长官邀请，先后住持"长子妙觉禅寺"[7]、"濩泽乾明禅寺"与"紫岩宝峰招提"[8]，碑阴另示安闲老人其他法嗣，知其门徒散布泽州众多寺院，其中即有青莲寺、

‹1› 参见陈高华：《元代大都的"旧刹"》，《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(第四辑)》页315－328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。

‹2› "安闲"是晋东南地区临济宗传播的重要僧人，详见后文。

‹3› 另由现存遗迹和文献可知，高平定林寺、碧落寺、金峰寺亦如。

‹4› 前揭(明)李侃修、胡谧纂《(成化)山西通志》卷二《山川》，页8。

‹5› (清)傅德宜修，戴纯纂：《(乾隆)高平县志》卷七《寺观》页11，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。

‹6› 前揭《山右石刻丛编》卷三十五，页38－41。

‹7› 长子妙觉禅寺在金代时就有村民从昭觉寺请去僧人住持，参见金大定三年(1163)《新修妙觉院碑》："是寺旧有古佛舍仙师堂……阒寂荒凉。于皇统五年八月，内有本村英贤张珪，率众耆宿请到昭觉下院昭觉寺僧道嵩居之，尊严圣像，肃敬殷勤。奈何堂宇疏漏，檐楹摧塌，遂告檀越。张珪集众耆宿首议重修之，众乃从之……起自贞元甲戌，至己卯功毕。构就九脊大殿，庄丽峥嵘，势若飞空。至大定初元，奉圣制创建无名额寺院，许令纳钱请额，赐名'妙觉院'。自后稍稍营葺……增开金地，通街造立三门，构厦前殿，绘画释迦牟尼佛塑像，观音献帐，饰云堂香积，一一新之……于第四五年事之云耳。"李玉明、王雅安主编，申修福分册主编：《三晋石刻大全·长治市长子县卷》页62－63，三晋出版社，2013年。

‹8› 当即为今泽州乾明寺与襄垣宝峰寺。

〔图十六〕资圣寺元碑碑阴
图片采自王树新编：《高平金石志》页550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



吉祥寺、宝应寺等。故至少入元以来，因安闲觉公的传法，不仅陵川一地，在泽州乃至上党地区，禅宗临济一派均颇为兴盛。

五　结论

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绵延不绝，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生活和思想的方方面面。一般认为，唐末五代以来，佛教趋于世俗化和平民化发展，崇信佛教的僧人团体和普通民众数量日趋增多。兴盛于唐代的义学宗派逐渐衰落，以慧能为代表的新禅宗在唐代中后期崛起，百丈怀海更设立禅院清规，独立禅寺，并制定相应的行为规范，会昌法难以来，“不立文字、教外别传”的禅宗在宋代以后风靡于世；有金一代，禅宗依然在佛教界占据主流；到了元代，统治者以藏传佛教为国教，喇嘛作为帝师，既是喇嘛教和西藏地区的领袖，也统领全国佛教。金元时期，禅宗中尤以临济、曹洞两宗为盛[1]。

泽潞地区的佛教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。本文从物质遗存的角度，关注泽州泽州佛寺后殿的早期遗构，并结合石刻史料，增进我们对宋元时期该地区佛教发展面貌的认识。

泽州佛寺中，有不少后殿的前檐铺作仍为金代遗存。从这些可见的、现存最古的旧材可以推知，金代泽州地区的后殿普遍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修建工程。结合石刻史料的记载，这次工程的目的当是为了扩大后殿的建筑空间。经过此次工程之后的佛寺后殿，其面阔和室内空间较寺院中央的佛殿体量更大。

同期碑文表明，这一时段的佛寺后殿作为法堂存在。故可以推知，在这一时期，人们对法堂建筑空间的规模有了更高的要求。作为禅宗寺院中的重要单体建筑，泽州地区于金代普遍扩建法堂，或表明它在寺院中的重要性有所上升。法堂可能被赋予需要较大空间的功能，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在法堂中进行的相关活动，而且当时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法堂扩建工程。这都提示我们，在金代时，禅宗在此地可能

‹1›　参见前揭任继愈总主编、杜继文主编《佛教史》，页405－436；刘浦江：《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03年第2期；刘浦江：《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》，《佛学研究》1996年；［日］高雄义坚著，陈季菁译：《宋代佛教史研究》，《世界佛学名著译丛·47》，华宇出版社，1988年；郭朋：《宋元佛教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；［日］野上俊静（方红象译）：《辽金的佛教》，《黑龙江文物丛刊》1981年第1期。

又有一次发展风潮。

不仅如此，通过现存寺院中元代碑文的相关记载，我们还能明确元代风行于当地的禅宗宗派是临济宗。

进入明代，为了适应同时期佛教崇拜对象与信仰内涵的变化，佛寺后殿又进行了空间的调整。尽管维修工程大多保留了早期斗栱，但不少遗存在梁架分椽方式上进行了较大的改换。保留较多早期梁架特点的后殿，其室内分椽方式与经后代大规模改造的后殿不同：早期后殿不设前廊，室内梁架为前四椽栿后乳栿，4—2分椽，而在那些仅余早期铺作的后殿，往往为劄牵对五(六)椽栿，1—5(6)分椽。这种分椽方式的变化提示我们，随着时代变化，当地佛寺中的后殿在陈设和使用上有相应的改变，这种改变对应着殿宇功能的变化，还可能指向信仰内涵的转变。结合碑文记载可知，至晚自明万历年始，佛寺后殿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前代作为“法堂”的功能，转而变为容纳佛像的殿宇。这种改换使得“法堂”转而成为“佛殿”，继续发挥它的使用功能。尽管作为“法堂”的后殿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但佛寺后殿建筑并没有消失。

通过对泽州地区佛寺后殿旧材的关注，可以观察到在历史变迁中，建筑空间是如何进行调整，以适应其对应功能的；通过建筑空间的变化，也可以对已不见于文字记载的、特定区域的宗教发展过程有更深入的认识。

附记：本文承蒙导师杭侃教授指导；感谢彭明浩、李若水、刘未、吴煜楠、尚劲宇等师友一同合作，结伴进行田野调查，并给予我无私的帮助；亦感念各位长期守护寺院的文保员对调查工作的支持与配合。

[作者单位：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，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]

（责任编辑：项坤鹏）